

数字时代的文化

「澳」约翰·哈特利 著

李士林 黄晓波 译

Facebook · YouTube · DIY · 维基百科

故事可以由任何人来讲述

曾经你只是一个粉丝，接下来你就该给粉丝签名了

所有人都成了自己的荷马，自己的塔利辛，吹奏着

自己的传令喇叭

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

JOHN HARTLEY

数字时代的文化

〔澳〕约翰·哈特利 著

李士林 黄晓波 译

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数字时代的文化 / (澳) 哈特利著; 李士林, 黄晓波译.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5
书名原文: 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
ISBN 978-7-308-13009-7

I. ①数… II. ①哈… ②李… ③黄… III. ①计算机
网络—文化研究 IV. ① TP39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3029 号

数字时代的文化

[澳] 约翰·哈特利 著 李士林 黄晓波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 雪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009-7

定 价 4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JOHN HARTLEY

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



启真馆出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经他本人善意的许可，献给理查德·霍加特

——“文化研究领域举止温和的超人克拉克·肯特”（Hartley, 2003: 25）

目 录

第一章 读写能力新探 1

神秘博士? 1

明察秋毫 4

数字读写能力有何用途? 11

多媒体读写能力——印刷的, 媒介的, 批判的, 数字的 15

为创新重塑教育 20

教育者的教育 24

创意劳动力 26

有创意的教育者? 27

作为分布式系统的学习 29

教育领域的创业者 31

第二章 从意识产业到创意产业 33

媒体产业研究: 地覆天翻? 33

产业: 现实? 比喻? 36

从产业到(社交网络)市场 39

“创意产业”的概念 42

创意产业: 试验毁灭? 48

供给与需求 50

- 社交网络市场 53
创造性破坏 55
知识增长：媒体产业研究的未来？ 57

第三章 诗人电视 61

- 要有伟大的诗人…… 61
周而复始！ 62
诗人电视：“从男爵大厅到乡巴佬小木屋” 66
叙述与政体——“人民的代表” 70
“思想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75
“雨后竹笋”——歌诗大会在全球范围的扩散 79
数字读写能力——从自制媒体到自制网络 81

第四章 YouTube 的用途 86

- YIRN——YouTube 先驱 86
印刷读写到数字读写 89
升级电视的“诗人功能” 92
YouTube：符号世界 94
来自远古的信息 96
“讲故事的人统治社会”——叙事的科学 101
叙事推理 103

第五章 数字叙事 106

数字叙事 106

规模：是小是大？ 107

传播：威尔士出口品？ 109

专家：仗势欺人还是乐善好施？ 114

专长：“天哪！看上去它好像能跟我说话一样！” 117

数字故事讲述服务于科学、新闻、想象力？ 121

第六章 阅读大众 124

文化研究与新闻学 124

新闻学的文化路径 125

“人人皆记者”提出的挑战 128

新闻业的部落属性 130

新闻是一种过渡形式 131

新闻与文化 133

人人皆记者 134

全民书写运动 136

全球化与编修型社会 137

第七章 作为消费者创业精神的时装 141

浪费——还是财富？ 141

学习机构：时装媒介 143

时装和现代性：中国款式	144
《Vogue》在中国：呈现风险文化	151
《Vogue》中的中国：端对端媒介化	155
富于创业精神的消费者：生活在风险文化之中	157

第八章 “未来是开放的未来” 160

丰裕哲学	160
西方人的心血	162
文化研究与社会变革	165
创造性破坏	168
表征之过剩与过剩之表征	171
从DIY到DIWO（从自己动手到大家动手）	173
全民创造力是一种具有推动力的社会技术	176
娱乐部	177
走向开放的未来	179
（再一次）走向文化科学	181

注 释 188

参考文献 197

致 谢 212

索 引 216

第一章

读写能力新探

“真理有其他的实现形式”

“为文明联邦效力的时候到了。”

——Giovanni Arrighi, Iftikhar Ahmad & Min-wen Shih(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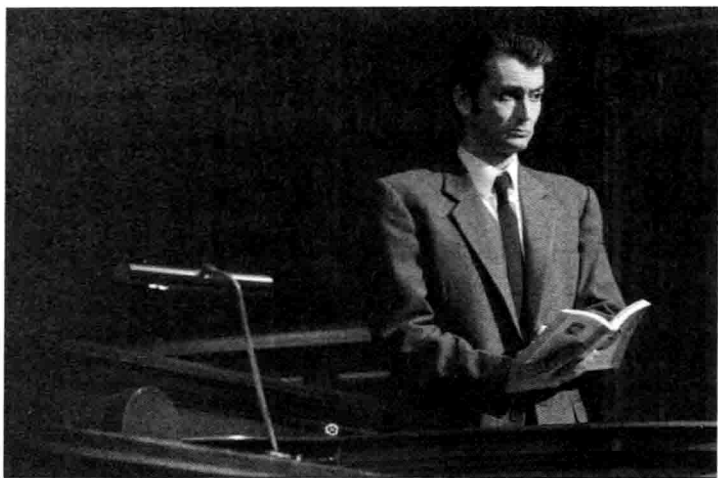
神秘博士？

英国—澳大利亚传统的文化和媒介研究奠基于半个多世纪前。1 其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在《读写能力的用途》(*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1957) 中制定了中小学和大学推行教育和学科改革的议程，他对尤其是娱乐媒介“滥用”读写能力的行为 (Owen, 2005) 提出了犀利的批评，赢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霍加特把焦点放在印刷媒介上，包括报纸、杂志、广告和低俗小说。自那以后，广播电视出现了。而今，尽管其尚未消亡，但已经开始丢盔弃甲，让位于网络和移动服务等继任媒介。重新审视识字能力的时候到了：在多媒体时代，“读写能力的用途”是什么？

霍加特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所选择的范例，显然也不在于其对个

别事物的判断，而在于他努力将个人想象的内在生活（the inner life of the individual imagination）与民主化社会及商业社会中媒介化意义的增长联系起来。他感兴趣的是，普通人如何将识字能力应用于日常生活，而不是当作商业的、公民的或者宗教的工具性技能。他将工人阶级社群的自下而上的“体面”的价值观看得比商业娱乐世界“棉花糖”式的华而不实更为重要。但最终他认识到，问题不会因为他厚此薄彼而得到解决。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力主将“批判性”读写能力（critical literacy）作为大众参与大众媒体的一种形式。然而，他并不认为知识分子的品味适合于每个人。正如他所言：“真理有其他的实现途径。”（Hoggart, 1957: 261）

霍加特本人最著名的一次对大众“读写能力用途”的公共干预，是为一家商业出版社所面临的淫秽指控作辩护。他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被邀请作为“专家证人”。他认为，D.H. 劳伦斯的小说不仅谈不上猥琐，恰恰相反，事实上该小说是“清教徒式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真真切切地在追求自己实现真理的方式。他的证言帮助出版社赢了官司（Paul Hoggart, 2006）。自然而然地，这次辩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读写能力的用途》两本书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两本书的出版商企鹅图书带来了额外的收入。这次辩护还间接催生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企鹅图书的老板，艾伦·雷恩爵士（Sir Allen Lane），送给霍加特一张支票，使他得以成立该研究中心（Hartley, 2003: 20-7）。这次审判后来被拍成电视剧《查泰莱事件》（BBC [威尔士] 2006年制作）。以饰演《神秘博士》的第十任博士而著名的大卫·田纳特（David Tennant）出演了理查德·霍加特这一角色。



《查泰莱事件》中出演专家证人理查德·霍加特的大卫·田纳特
BBC 2006: <www.bbc.co.uk/bbcfour/cinema/features/chatterley-davies.shtml>.

据《卫报》的政治专栏作家、霍加特的大儿子西蒙称，田纳特的演绎还算出色，只是有一个明显失误：

父亲的扮演者大卫·田纳特（主演过《布莱克浦》[*Blackpool*]和《卡萨诺瓦》[*Casanova*])是非常棒的演员。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观看过去的访谈，甚至研读当时报纸上的图片，把父亲的照片放在自己的手机里。他的表演非常传神：从西装、发型到约克郡的口音，甚至说话的节奏，都惟妙惟肖。唯一不像的是鬓角。为了出演父亲这个角色，田纳特不得不从《神秘博士》在威尔士的拍摄地请假 24 小时。正如田纳特解释说，鬓角没法在一天长回来。

我想，这也算是扬名了吧——研究者和服装师们细细琢磨你外表的每一个细节，而你出现在证人席上，以《神秘博士》的脸示人。（Simon Hoggart, 2006）

- 4 霍加特的小儿子、《泰晤士报》的电视评论人保罗在评论该剧时也持同样观点：

“还行吧？”在演完父亲在法庭上的角色后，大卫·田纳特略带紧张地问道。我说：“棒极了，你演得非常好。”我的确是那样认为的——大卫和父亲都非常出色。（Paul Hoggart, 2006）

保罗·霍加特评论说：“安德鲁·戴维斯的这一历史再现的最奇怪的效果在于，[提醒我们] 审判中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本书力图探讨并由此生发开去的就是[保罗所提及的]部分悬而未决的问题。

明察秋毫

理查德·霍加特知道，在商业民主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钟爱的媒介娱乐形式。因此，为了推广“批判性”读写能力，实现所有人的知识解放（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必须接受人们不同的喜好，认真对待人们自我表达的不同方式，以及他们所喜爱和信任的提供信息的媒介，不管这媒介是赏心悦目的娱乐还是令人难堪的逆耳之言。这种洞见与正统的知识权威大逆其道。从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到布拉德雷（A. C. Bradley）、理查兹（I. A. Richards）和李维斯（F.R. Leavis），霍加特之前的批评家们滑稽地认为，如同工业界和科学界人士各有专长一样，批评家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判断、评价和品位形成等问题上有独一无二的专长。这种观点拒绝承认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社会（Carey 1992）有同样的能力。批评家们此举旨在区别“阳春白雪”（艺术）与“下里巴人”

(大众感受), 在“鉴赏力”问题上手把手地教导无知百姓。他们认为, 人文领域的“鉴赏力”等同于科学领域的专门方法。 5

经由李维斯夫妇(F. R. Leavis, Q. D. Leavis)及其杂志《细究》(*Scrutiny*)在知识阶层中宣传普及, 这种态度成为一种常识性的政策背景, 至少持续到撒切尔主义出现。英国的文学批评家最后一次受到他人重视而非孤芳自赏是在名为《广播的未来》(*Future of Broadcasting*, 1977)的安南报告里。正是这个报告最终使得英国第四频道于1982年成立。安南报告将文学批评家看作批评性公民的代表, 尤其是在涉及性话题的电视节目里, 需要他们矫正医学专家和社会调查者们的曲妄之词。

他们的观点需要经诸如文学批评家或者世间敏锐之男女细细审视; 这些人习惯于在价值、是非等问题上明察秋毫, 不为专家所吓倒, 他们有足够的技巧把专家们置于令人尴尬不安的被盘问的境地, 并且能迅速戳穿把伪科学当作铁证的装腔作势。

霍加特本人正是这里所想象的那种批评性公民。相对专家和党同伐异者, 他一直更喜欢“勤劳、内心公正的有悟性的平头百姓”(Hoggart, 1997: 289)。然而, 问题在于文学批评家事实上并非“平头百姓”, 而是在各自狭窄的专业领域里可以“明察秋毫”的专家。认为当关涉“性行为”的问题出现在公众讨论中时这些人可以为普通大众代言的观点, 即便在当时, 也是显得荒唐可笑的(我本人就是讽刺挖苦者之一: 参见 Goulden & Hartley, 1982)。不仅可笑, 从反面看, 这甚至可以被视为是“歧视性的”(discriminatory), 因为这种观点仿佛将批评家与正统的价值取向以及源于差异评判的各种歧视归为一类。这里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文本间, 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例如在性别、种族和阶级上的。 6

霍加特在此前 20 多年就认识到，为百姓代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众的品位已经无法再被生拉硬拽，不加辨别地认同所谓的、自我标榜的知识分子的所有主张。显然，他们的判断囿于自身家庭、年龄、阶层、性别、种族、民族以及殖民状况等因素。价值观——文化的，以及政治和道德的——是日益差异化的人群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的语境中形成的。霍加特知道那些由“他者”（other）经验所形成的价值观——真理的其他方式——并不是反智的，只是经由其他方式，达成智慧罢了。因此，探究非知识分子公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面临的机遇与诱惑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这就是研究流行文化中媒介化娱乐的直接起因。简而言之，这也是《读写能力的用途》一书的成因。

7 尽管对供大众消费的娱乐吹毛求疵（《读写能力的用途》后半部分），霍加特极力主张流行文化给价值观和判断力带来了正面影响（《读写能力的用途》后半部分）。但即使在左派中，这种观点也一直是少数派的。左派继续奉行现代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观点，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将流行文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的对立面，认为流行文化容易受从商业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力量操控，因而是不可信任的。奇怪的是，极少有文艺知识分子担心流行文化受共产主义的操控。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是个例外。在他 1962 年出版的小说《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有一个年轻恶棍的黑话（称为 Nadsat 语）^[1]，是俄语渗透的结果（Nadsat 是俄语的后缀，相当于英语的 -teen）。

直至今日，对流行文化的怀疑仍然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重要思潮。例如，文艺理论家约翰·弗洛在《文化研究与文化价值》（John Frow,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Value*）一书中写道：

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将自己与反智主义联系起来，有

一个清楚的限度；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或应该停止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批评，也有一个限度。（1995：158）

在评述这一段话时，评论家阿伦·辛菲尔德认为（Alan Sinfield），弗洛此话目的在于：

也许带些感伤地重新评价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流行文化的愿望：事实上，他们在流行文化中会碰到让人难以接受的种种态度。当然，不应该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即，流行文化是法西斯主义的，而高雅文化是进步的。（1997：xxv）

在辛菲尔德看来，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同样，流行文化则被认定是非中产阶级的，流行文化中的“流行”意味着民众（demotic）（卑下）而非民主（广博），仿佛知识分子是局外人，因而可以超然事外。为了在知识分子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制造对立，这是必然的一步。这样，就可以将后者建构（cast）成“角力场”（site of struggle），进步力量可以在此间与“大众”（masses）中显而易见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一决高下。 8

这的确是霍加特的继任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着力描述的阿尔都塞式（Althusserian）的文化研究纲领（1981：239）。尽管霍加特奉行左派进步主义（leftist progressivism），但这并非他的文化研究纲领，因为他并不认为，何为进步或者何为法西斯主义，应该由涉身局外的批评家来作判断。相反，他认为这种判断，可能属于那些“真理的其他途径”。换言之，霍加特的文化研究构想本质在于，认为无论涉及品位形成、政治进步主义抑或是想象力的解放，流行文化都能够自我纠错（self-correcting）。而霍尔、辛菲尔